

中国贸易顺差研究 的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

王剑锋 顾标*

摘要: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首先分析确认了影响中国贸易顺差的三个基本因素,即人民币实际汇率、贸易政策以及国民收入总量,但鉴于2004-2008年期间贸易顺差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实际走势,仍然无法通过这三方面的变化情况予以说明,因而进一步将中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归结为储蓄投资失衡这一国民收入的结构变化。通过对相关文献及政府有关政策的综合分析发现,无论是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偏向,还是引起我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大幅下滑的大规模数量型货币政策,可能都与中国式分权体制存在着重要关联。未来还应针对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关键词: 贸易顺差 国民收入分配 储蓄率 财政分权 信贷约束

一、引言

金融危机发生后,受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影响,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研究持续贸易顺差问题的紧迫性似乎有所减弱。但需要注意的是,截至目前为止,在贸易顺差成因方面,仍然存在若干未能说明的问题。首先,为什么同样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没能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国从而呈现持续贸易顺差呢?其次,如果认为政府干预要素价格是我国具有成本优势并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政府具有更大的经济干预能力时期,很多年份反倒出现了逆差呢?第三,我国从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的贸易顺差,为什么会从2005年这个时点上出现跳跃性增长呢?

上述问题表明,已有研究成果还未能将我国持续贸易顺差现象背后的微观机制分析清楚。这在实践中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旨在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由于建立在我们还“不尽了解”的经济机制之上,很可能“事倍而功半”。在平抑短期经济波动的同时,不仅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还会加大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2009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30.1%,以及第二产业增速高于第三产业、重工业增速高于轻工业,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很显然,继续深化对贸易顺差形成机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国真正实现向内外均衡型增长模式的转变,还有可能成为破解我国诸多宏观经济失衡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从当前贸易顺差问题研究的总体情况看,学术界已经从多个角度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各个研究角度间存在着交叉与重叠,无法通过一条清晰的分析脉络,厘清贸易顺差问题的研究路径及其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要在这一重大领域取得新的突破,首先需要做好对已有成果的梳理工作。本文主要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确定研究起点与分析主线;第三至六部分对相关研究的分析脉络进行梳理;第七部分则根据总结得到的前沿性问题,进一步提炼出未来的研究重点;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关于研究起点与分析主线

在贸易余额的主要影响因素方面,克鲁格曼(1998)将贸易余额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实际汇率、国内可支

* 王剑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应用金融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029,电子信箱:wjfu@126.com;顾标,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00444,电子信箱:bilgu@shu.edu.cn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外需贡献‘先大起后大落’的形成机制研究——金融约束视角的分析”(09YJ79003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配收入与贸易政策。还有学者认为,影响因素包括国民收入、名义汇率与相对价格水平(Wilson and Takacs 1979, Oskooee 1998)。Matesanz和 Fugarolas(2007)根据出口与进口的决定公式,推导得到影响贸易余额的因素主要有本国国民收入、其他国家国民收入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在以上观点存在的差异中,由于一国所有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加总等于其国民收入,因而国内可支配收入属于国民收入因素。贸易政策主要包括关税、出口补贴、配额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内容。其中,关税与出口补贴是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来发挥作用的,因而可将其归入到同时包括价格与名义汇率的实际有效汇率因素。配额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余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切断了实际有效汇率因素发挥作用所需的市场化条件。这两方面限制措施的放松主要是在短期而无法在长期中持续发挥影响。

总的来看,除了国民收入和贸易政策因素以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从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成立与否的角度来分析汇率变化的影响。然而,以麦金农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却从贸易顺差的内生性抑或外生性的讨论出发,分析指出仅从贸易条件角度关注汇率影响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以“仅有贸易往来而没有资本流动”的“孤岛经济”为假设前提的。这一前提并不符合当前条件下开放经济的现实情况(McKinnon, Lee and Wang 2009, Qiao 2007)。他们认为,本币升值在导致本国产品变得更贵从而减少出口的同时,还会使得本国投资成本提高以及外汇储备的购买力缩水,并进一步通过FDI减少和财富贬值效应带动进口的下降,由此抵消其降低贸易顺差的作用。因而,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即使采用无法被公众预期到的升值路径(a discrete appreciation),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未必会下降(Qiao 2007)。

尽管从上述分析看,在汇率的影响方面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我们仍然可以梳理出如下的分析脉络: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情况下,即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具有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但2005-2008年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贸易顺差增长的实践却表明,一些非汇率因素在发挥着相反的影响作用。而对于这些非汇率因素作用机制的分析和研究,很可能是破解我国贸易顺差问题的关键环节。

三、关于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作用

(一)对于实际有效汇率影响作用的探讨

Wolf(2005)、Anthony(2007)和Feldstein(2008)在其研究中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采用了重商主义政策,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有意识的干预来刺激出口和经济增长,并造成了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了缓解全球范围内的内外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应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应该说,如果中国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具有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从已有的实证研究情况看,尽管所得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卢向前、戴国强,2005;马丹、许少强,2005;李科,2008;王相宁、李晓峰,2005;金洪飞、周继忠,2007;朱真妮、宁妮,2002;戴祖祥,1997),但多数分析支持中国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的结论。

中国政府自2005年7月起实施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希望通过人民币的稳步升值来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测算,截止到2008年12月,扣除通货膨胀差异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较汇改前升值23.9%。但与此同时,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一度还出现了大幅上升的现象。2005-2008年,净出口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依次为5.42%、7.51%、8.88%和7.87%。尽管一些支持J曲线效应存在的研究,认为汇率变化可能会有4~9个季度的滞后,因而会推迟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影响(卢向前、戴国强,2005;吴开兵等,1999;林清泉、杨丰,2007;钟伟等,2001;李治国等,2007),但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顺差增长的背离期限看,人民币汇率升值所具有的J曲线效应早就该开始发挥作用了。为什么到了2008年,贸易顺差比重仍然远高于2005年呢?

(二)若干研究视角及其与实际有效汇率因素的关系

尽管有部分研究指出了新的因素,但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与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着交叉与重叠,并不构成抵消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作用的来源。在这当中,主要有两个类别:第一类是国际产业转移论。Greenaway等(2008)利用亚洲国家1990-2003年期间数据所做的分析显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具有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替代作用,但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替代程度存在差异。因为劳动成本的优势,中国主要替代了发展水平较高的亚洲国家的出口,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替代并不明显。Shafaeddin(2004)则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ices)在更大的国别范围内进行比较后发现,中国对韩国、马来西亚这些较高收入亚洲国家的出口具有较为显著的替代作用,但对南亚、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中低收入国家的出口没有明显影响。Feenstra等(1999)通过分析部分亚洲国家对美国出口下降与中国对美国出口上升的关联性事实,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文东伟等(2009)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证实了FDI的大规模流入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外资参与程度高的行业尤为如此。巴曙松(2006)、王晋斌和李南(2007)还认

为,除了劳动力成本因素以外,中国在基础设施及其他产业配套措施领域同样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使得很多出口型产业在全球产业布局重新调整过程中,由其他国家转移到了中国。

从上述内容看,国际产业转移论从中国所具有的成本优势角度,强调了国际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优势。而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措施方面的优势,也只是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但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国际贸易余额的影响,仍然会通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作用于实际有效汇率。因此,国际产业转移论所蕴含的影响,已经被包含在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当中了。不仅如此,此类观点仍然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面。比如,为什么同样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提供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措施呢?

第二类观点是政府积极干预论。世界银行(1993)在其报告中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会采取积极的政策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增加出口中的工业产品份额。外向发展政策加上汇率政策,会成为加速GDP增长、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手段。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将其进一步归结为政府将引资数量作为官员考核指标,同时长期推行吸引FDI优惠政策的结果。许煌等(2007)则强调了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要素成本优势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以上内容看,政府积极干预论将中国产业配套措施与基础设施优势的形成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政府的积极干预措施。但与国际产业转移论一样,其对价格的影响已经被纳入到实际有效汇率当中。另外,仍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不能积极干预呢?尽管林毅夫等(1999)曾将人均资源过少作为激励政府实施积极干预政策的外在因素,但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少国家的人均资源指标同样处在较低的水平,却未能激发政府对经济进行合理干预呢?

四、谁抵消了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影响?

(一)贸易政策还是国民收入?

从影响贸易余额状况的基本因素看,与实际有效汇率并列,可能发挥抵消作用的因素主要有贸易政策和国民收入。贸易政策因素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个是国际贸易政策环境,另一个是国内的贸易政策。而对于前者来说,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入世”。Anthony(2007)曾指出,加入WTO是中国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入世后贸易壁垒的削弱,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从而促进了出口的迅速增长。Herrero和Koivu(2007)则以中美入世谈判成功的1999年末为界限,将所有样本分为1994-1999年以及2000-2005年两个组别。通过观察中国出口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是否变得更加敏感,来判断入世对中国贸易余额的影响情况。其实证结果发现,入世前国外需求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在入世后的组别中,不仅在统计上显著而且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然而,一方面,加入WTO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对等性。中国在获得更大出口市场的同时,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度也在加大。比如,中国政府承诺并实施了关税税率的大幅下调以及颇受诟病的农产品与服务业开放。另一方面,即使中国出口受益更大一些,出口市场扩大对净出口增加的影响也应该主要表现在短期而无法充当长期性因素。Wiemer(2008)在对进出口数据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加入WTO使得中国进口和出口以大体相当的速度同时出现了快速增长。在前几年中,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只是从2005年开始的三年中,出口出现了27.6%、23.9%和20.4%的增速,而进口在对应年份的增速仅为16.9%、16.7%和15.6%。出口增速持续大于进口的情况,导致了出口顺差占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在国内贸易政策方面,Martin等(2003)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加工贸易进口以及外商企业的资本品进口在中国几乎获得了完全自由化。在1996年,这两方面的进口额大约占到总进口额的一半。其分析暗示,中国对外向型贸易企业的鼓励政策,是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并导致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裴长洪(2009)在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前贸易顺差增速放缓现象时同样认为,给予外向型企业的贸易优惠政策,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一方面,对于2005-2008年期间来说,上述国内优惠贸易政策已经属于既有的优惠措施了,并不具有进一步的贸易顺差增长效应。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都有这样的政策安排。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没有像中国如此严重呢?另外,国内优惠政策最终仍然需要通过包含相对价格的实际有效汇率来发挥作用。因此,其同样不能构成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作用的因素。^①

(二)国民收入抵消作用的具体机制:总量还是结构?

^①另外,也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人民币汇率、国民收入总量以及贸易政策这三方面因素对贸易顺差的影响,需要满足“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样一个重要前提。然而这一假设在现实当中尤其是长期视角下也许并不成立。这样一来,在贸易顺差的分析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也需要探讨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另一个可能对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产生抵消作用的因素是国民收入。在中国国民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世界平均增速的情况下,国民收入总量效应的影响应该是减少顺差。这就说明,国民收入的总量效应与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影响具有同向性,无法发挥抵消作用。这样一来,抵消效应的可能来源只能是国民收入的结构方面。

(三)对国民收入结构效应的探讨

在国民收入的结构分类方面,有来源结构、分部门收入结构以及支出结构三类主要方法。由于支出结构中的净出口与贸易顺差具有直接的关联,因此,对国民收入结构效应的探讨,首先选择在支出结构方面。^①

从国民收入支出结构角度所做的各类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储蓄投资差额论。Choi等(2008)认为,部分国家储蓄“充斥”且不能被国内投资充分吸收,是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基本原因。虽然有不少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Herbertsson and Zoega, 1999; McKinnon and Schnabl, 2006),但根据Chenery和Stout(1966)提出的“两缺口”模型(two-gap model)不难推得,在不考虑收益与转移项目的情况下,贸易顺差与储蓄大于投资两类现象之间,本来就是互为表里,它们之间并非因果关系而是共同由其他因素所决定。

进一步的探讨方向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部分学者从金融体系效率差异论角度进行了探讨。Feenstra等(1999)认为,相对低效的中国金融体系导致中国的储蓄无法充分向投资转化,并在国际收支中表现为贸易顺差。完善国内金融市场,拓宽非国有企业获得融资支持的管道,以及开放金融业,允许更多的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有助于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Kasuga(2004)在解释发达国家储蓄、投资相关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时指出,发达国家因为拥有高效的金融体系,使其国民储蓄能够更为充分地向投资转化,因而储蓄与投资之间具有更强的相关性。相反,发展中国家储蓄与投资相关性较弱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国内金融体系的储蓄配置能力较弱,储蓄的增长未必能带来国内投资的增长。其分析暗示,作为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由于不能转化为高投资,往往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流向国外。李扬(1998)在解释中国资本项目顺差并未引起实物资本流入问题时所提出的内外金融部门间的“效率互补”假说,也具有类似的观点。然而,金融体系效率差异论,只是说明了中国金融体系配置能力不足,但为什么中国会具有超出本国配置能力的储蓄率呢?

五、国民收入支出结构效应的进一步探讨:高储蓄率的成因分析

学界对中国高储蓄率成因的分析,具体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别。其中,前三类观点主要关注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并在相当一段时期成为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研究重点。第一类是居民预防储蓄论。Wiemer(2008)结合中国的国情分析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城镇居民的“铁饭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集体社保体制也不复存在。面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急剧变化,为了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教育、医疗和退休生活支出,降低家庭未来生活的风险,中国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应该说,此类观点能够解释一段时期内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原因。但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政府加大了社会民生支出的力度,义务教育阶段居民负担明显下降,包括新农合在内的城乡社保体系建设也取得了明显进展。可正是在这几年中,我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迅速上升。显然,继续将居民预防储蓄动机作为近几年我国居民储蓄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多少有些牵强!

第二类是文化因素影响论。这类观点重点强调了东亚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特征中崇尚节俭、反对奢华因素的影响。然而,尽管Venkatesh(1995)、Jain和Joy(1997)以及叶德珠(2008)从概念框架角度论述了文化因素对储蓄以及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但针对文化因素影响作用所做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上述结论。Carroll等(1994, 1999)曾分别利用加拿大和美国的家庭调查数据,通过比较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移民的储蓄模式,来检验文化因素是否对储蓄具有显著影响。其所得结果显示,来自高储蓄率国家移民的储蓄率,并不显著高于来自低储蓄率国家的移民。对亚洲国家尤为如此。

第三类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论。在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作用的分析上,Feenstra等(1999)除了指出工作人口比重提高因素对中国储蓄率具有正向影响以外,还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减少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使得未来对家庭养老的可依赖程度下降,因而对储蓄率产生了进一步的正向效应。Wakabayashi和McKellar(1999)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同样支持了抚养率与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关系。蔡昉(2004)所提出的人口红利因素具有相近的作用机制。然而,李扬和殷剑峰(2007)、He

^①尽管从实际统计数字看,由于利息支付假说中提及因素的影响,全世界国民收入并不平衡。但从理论上讲,本国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应与其他国家存在着互补性。因而,通过对本国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分析,可以推理得到其他国家国民收入支出结构的影响效应。

和 Cao(2007)结合中国现金流量表的新增数据,对中国高储蓄率所做的部门分解却发现,推高中国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企业部门而非居民部门。这就从实证角度否定了人口年龄结构影响论的观点。

第四类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偏向论。与前述强调中国居民储蓄率过高导致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分析不同,此类观点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偏向导致的结果。对此,无论是李扬和殷剑峰(2007)、He和Cao(2007)利用现金流量表数据,还是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针对现金流量表存在的数据质量问题而进行的调整,所得到的实证结果都显示,伴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的下降,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比重出现了大幅上升。樊纲等(2009)所做的分析也支持了上述判断。由于企业没有消费,始终保持100%的储蓄率。同时,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推高了政府的储蓄意愿(龚锋、卢洪友,2009;傅勇、张晏,2007)。企业和政府部门收入比重的提高,必然会导致三部门加权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张明,2007)。

六、关于国民收入分配部门结构偏向的形成机制

在政府收入份额提高的原因分析中,高培勇(2006)与王剑锋(2008)将近年来政府税收增长过快的原因,归结为1994年税制设计中的“宽打窄用”以及征收率不断提高的影响。安体富(2002)则通过大、中、小三个口径宏观税负的对比分析,强调指出了我国非税负担过重政府在收入比重过高当中的重要作用。

在居民与企业收入比重变化的分析中,Wiemer(2008)、樊纲等(2009)指出了中国政府在较长时间中没有从国有企业获得分红的影响。Kuijs(2005)和Wiemer(2008)还进一步强调了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在总产出中占据较大份额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要素份额的上升是导致资本收入提高的直接原因。李稻葵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下降的因素还包括工业比重的变化和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另外,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也使得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盈利分配的谈判能力上升较快,并导致了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综合以上观点,可以认为,我国资本要素的所占比重提高,不仅会使资本收入所占份额出现同比例的上升,还通过降低劳动力应有的稀缺程度,相对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进一步使得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下降。

尽管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认为,我国统计数据对农业部门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存在高估,进而夸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在劳动报酬比重下降中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发现只是说明了中国对产业结构调整前的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有所高估。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本来就比较低。但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为什么会如此之低呢?

应该说,将中国高储蓄率的分析与金融体系效率差异论相结合,可以把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归结为企业与政府收入比重上升的因素,从而使贸易顺差成因问题的研究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而且,据此还可以建立国民收入的部门结构变化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关联。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的下降,具有相对减少消费品进口的作用。而在国内金融体系具有较低配置效率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提高所带来的国民储蓄增量,无法充分地转化为投资,因而对投资品进口的拉动作用也会相对下降。这两方面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国民收入增长中的部门结构效应,不仅抵消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作用,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贸易顺差。

尽管如此,将上述观点结合起来的分析,仍然存在着未能说明的问题,使其可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最终根源。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劳动要素所占份额会出现下降呢?尽管文东伟等(2009)分析指出,FDI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先海和徐圣(2009)则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归结为我国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然而,上述分析仍然未能揭示问题的根源。比如,为什么FDI会在我国而未能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挥相应的负面作用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发生了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呢?以上疑问表明,在中国国民储蓄率提高以及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的背后,很可能还存在更为深刻的理论逻辑。

七、未来的研究展望

从已有研究的总体情况看,尽管有关贸易顺差问题的分析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着如下两个明显未能说明的问题:第一,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产业结构重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不利影响在我国表现得这样突出?第二,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占比会在2005-2008年这一期间急剧上升?针对这两个问题,并结合储蓄投资失衡的分析思路,我们尝试提出如下两个研究重点。

(一)研究重点之一: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扭曲产业结构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我们注意到,从20世纪90年代起,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国内存在的地区间主导产业趋同及市场割据的问题(沈立人、戴园晨,1990;Young,2000;Naughton,1999;周黎安,2004;胡向婷、张璐,2005;陆铭、陈钊,2009)。

上述现象暗示,各地区都存在着强烈的“出口”冲动,不仅要把商品和服务出口到国外,还要出口到省外。随着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到来,学术界在“中国式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及其经济贡献方面,已经逐渐达成了共识(Qian and Roland 1998 张军, 2003 王永钦等, 2007, Jin, et al, 2005 Blanchard and Shleifer, 2000 Frascini 2006 Bardhan 2006)。然而,已有研究在强调“中国式分权”的影响作用时,主要着眼于其对 GDP 总量指标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少有文献将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高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联系起来。后者既包括“贸易顺差比重过大”的现象,也包括“居民收入比重过低”等问题。为了实现本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往往会把 GDP 创造能力强、税收贡献大的重工业,作为本地招商引资的首选。然而,产业结构中资本要素密集度的提高,可能会通过减少劳动报酬的相对份额,而最终导致居民收入比重的下降。

(二) 研究重点之二: 融资体系与货币政策变迁对储蓄配置率的影响

结合公共选择与财政分权理论的观点不难判断,政府官员事实上希望同时运用净出口、消费和投资来拉动 GDP 增长。然而,消费拉动模式由于受到消费惯性、持久收入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与出口拉动模式相比,投资拉动要更多地受制于信贷约束(credit constraints)状况的影响。因循这一分析线索, Song 等(2010)认为,由于国有工业企业更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因而在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时期,融资体系对储蓄配置率较高,国内投资对国民储蓄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然而,随着非国有工业企业比重的上升,中国金融体系的储蓄配置率出现了下降,并导致越来越多的储蓄无法转化为国内投资,只能以出口的形式转移到国外。但其观点不能解释的是,国有企业的破产高峰发生在 1995-2002 年,而中国贸易顺差的急剧上升却发生在 2005-2008 年。在进一步收集这一期间的信贷数据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大规模的“央票发行”是这一时期储蓄配置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依然存在的疑问是,同样是抑制宏观经济过热,为什么 1992-1996 年期间中央银行却主要依赖“加息”这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呢?另外,结合经济过热时期中央与地方围绕宏观调控存在博弈行为这一背景,对储蓄配置率下降具有重大影响的“央票发行”,到底是一次偶然现象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呢?要对这些疑问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还需要对融资体系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手段的变迁过程及其对储蓄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八、结语

针对中国贸易顺差已有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交叉与重叠,本文在选择研究起点的基础上,对相关研究的分析脉络进行了梳理。我们总结确认了贸易顺差成因领域的两个前沿性问题:一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产业结构重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不利影响在我国表现得这样突出?二是贸易顺差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为什么会在 2005-2008 年这一期间急剧上升?以此为基础,我们对未来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展望,分析提出“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扭曲产业结构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以及“融资体系与货币政策变迁对储蓄配置率的影响”这样两个研究重点。

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分析梳理工作仍然是初步的,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由于贸易顺差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贸易现象,未来应进一步将储蓄投资失衡与微观贸易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清楚。同时,信贷约束不仅表现在信贷渠道上,还应包括企业信用、政府信用以及财政支出等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途径。因而,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于信贷约束因素的分析,完善有关的指标设计。此外,如何解释国内各地区贸易顺差与逆差并存的省际差异现象,也需要我们在未来研究中给予关注。

参考文献:

1. 安体富, 2002 《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研究》第 2 期。
2. 巴曙松, 2006 《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背景下的宏观金融政策: 挑战与趋势》,《国际金融》第 9 期。
3. 白重恩、钱震杰, 2009a 《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4. 白重恩、钱震杰, 2009b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 3 期。
5.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 1998 《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173-190, 408-409 页。
6. 蔡昉, 2004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第 2 期。
7. 戴祖祥, 1997 《我国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 1981-1995》,《经济研究》第 7 期。
8. 樊纲、魏强、刘鹏, 2009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经济研究》第 8 期。
9. 傅勇、张晏, 2007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第 3 期。
10. 高培勇, 2006 《中国税收持续高增长之谜》,《经济研究》第 12 期。
11. 龚锋、卢洪友, 2009 《公共支出结构、偏好匹配与财政分权》,《管理世界》第 1 期。
12. 胡向婷、张璐, 2005 《地方保护主义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 2 期。
13. 黄先海、徐圣, 2009 《中国劳动收入下降的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经济研究》第 7 期。

14. 金洪飞、周继忠, 2007: 《人民币升值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吗? ——基于 1994 - 2005 年间月度数据的贸易弹性分析》, 《财经研究》第 4 期。
15.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2009: 《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 《经济研究》第 1 期。
16. 李科, 2008: 《马歇尔 - 勒纳条件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时代经贸》第 6 期。
17. 林清泉、杨丰, 2007: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J 曲线效应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11 期。
18.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9: 《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 ——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第 5 期。
19. 李扬, 1998: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 《经济研究》第 2 期。
20. 李扬、殷剑峰, 2007: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 ——基于 1992 - 2003 年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经济研究》第 6 期。
21. 李治国、徐剑刚、曾利飞, 2007: 《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存在 J 曲线效应吗?》, 《世界经济研究》第 3 期。
22. 陆铭、陈钊, 2009: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 ——为什么经济开放能加剧地方保护?》, 《经济研究》第 3 期。
23. 卢向前、戴国强, 2005: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 1994 - 2003》, 《经济研究》第 5 期。
24. 马丹、许少强, 2005: 《中国贸易收支、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6 期。
25. 裴长洪, 2009: 《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 2006 - 2008》, 《经济研究》第 4 期。
26. 沈立人、戴园晨, 1990: 《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 《经济研究》第 3 期。
27. 王剑锋, 2008: 《中央集权型税收高速增长路径: 理论与实证分析》, 《管理世界》第 7 期。
28. 王晋斌、李南, 2007: 《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的原因、现状及未来展望》,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 11 期。
29. 王永钦等, 2007: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 ——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 《经济研究》第 1 期。
30. 王相宁、李晓峰, 2005: 《马歇尔 - 勒纳条件的实证分析》, 《运筹与管理》第 6 期。
31. 文东伟、冼国明、马静, 2009: 《FDI 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管理世界》第 4 期。
32. 吴开兵、曹均华、俞自由, 1999: 《J 曲线效应、生产率差异与我国汇率政策》, 《上海经济研究》第 2 期。
33. 许煌、徐翱、尚长风, 2007: 《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与贸易收支顺差》,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 11 期。
34. 叶德珠, 2008: 《东亚国家高储蓄、低消费之谜的行为经济学解析》, 《亚太经济》第 3 期。
35. 余永定、覃东海, 2006: 《中国的双顺差: 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 《世界经济》第 3 期。
36. 张军等, 2003: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经济研究》第 3 期。
37. 张明, 2007: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储蓄率研究的最新动态》, 《世界经济》第 4 期。
38. 钟伟、胡松明、代慧君, 2001: 《人民币 J 曲线效应的经验分析》, 《世界经济》第 1 期。
39. 周黎安, 2004: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经济研究》第 6 期。
40. 朱真妮、宁妮, 2002: 《中国贸易收支弹性分析》, 《世界经济》第 11 期。
41. Anthony, M a k in 2007. “ Does Ch in a ’ s H u g e E x t e r n a l S u r p l u s I m p l y a n U n d e r v a l u e d R e m i n b ? ”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15(3): 89- 102
42. Bardhan, P. 2006 “ Aw a k e n i n g G i a n t s ’ F e e t o f C l a y : A C o m p a r a t i v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t h e R i s e o f C h i n a a n d I n d i a ”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China and India’s Economic Reforms, Shanghai China, July1- 2
43. Blanchard, Olivier and Andrei Shleifer 2000. “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 NBER Working Paper 7616
44. Carroll C., B. K. Rhee and C. Y. Rhee 1994. “ Are There Cultural Effects on Saving? Some Cross Sectional Evidence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3): 685- 699
45. Carroll C., B. K. Rhee and C. Rhee 1999. “ Does Cultural Origin Affect Sav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Immigrants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8(1): 33- 50
46. Chenery, H. B., and A. M. Strout 1966 “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4): 679- 733
47. Choi H., N. C. Mark, and D. Sul 2008 “ Endogenous Discounting, the World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5(2): 30- 53
48. Feenstra Robert W en Hai W ing Tye W o a n d Shunli Yao 1999 “ The U. S. - China Bilateral Trade Balance Its Size and Determinants ” NBER Working Paper 6598
49. Felstein, Martin 2008 “ Resolving the Global Imbalance: The Dollar and the US Saving Rate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3): 113- 125
50. Fraschini, Angela 2006 “ Fiscal Federalism in Big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 Working Papers 60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Choice- POLIS
51. Greenaway, David Aruneeam Mahabir and Chris Mihov 2008 “ Has China Displaced Other Asian Countries’ Exports? ”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2): 152- 169
52. He X., and Y. Cao 2007. “ Understanding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15(1): 1- 13
53. Hebertsson T. T., and G. Zoega 1999 “ Trade Surpluses and Life-cycle Saving Behaviour ” *Economics Letters*, 65(2): 227- 237
54. Herrem Alicia and Tuuli Koivu 2007. “ Can the Chinese Trade Surplus Be Reduced through Exchange Rate Policy? ” BOFIT Discussion Papers 61- 40
55. Jain, A. K., and A. Joy 1997. “ Money Matter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Consumption, Saving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8(6): 649- 675

56. Jin, H., Y. Qian, and B. Weignast 2005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 1719-1742.
57. Kasuga, H. 2004 "Saving-investment Correl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s Letters* 83(3): 371-376.
58. Kujiş, Louiş 2005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633.
59. Martin, William, Betina Damaran, Thomas W. Hertel, and Elena Ianchovichina 2003 "Trade Policy, Structural Change, and China's Trade Growth" In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Chinese Policy Reform at the Millennium*, ed Nicholas Hope, Dennis Tao Yang, and Muyang Li, 153-17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0. Matesanz Gómez David and Fugarolas Álvarez - Ude, Guadalupe 2007, "Exchange Rate Policy and Trade Balance: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he Argentine Experience Since 1962" MPRA Paper 151, posted 07.
61. McKinnon, Ronald, Brian Lee, and Yi David Wang 2009. "The Global Credit Crisis and China's Exchange Rate" Working Paper, Stanford University.
62. McKinnon R., and G. Schnabl 2006 "China's Exchange Rate and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in Wages, Prices and Interest Rates"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1720.
63. Naughton, Barry 1999.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 Paper for Conference on Policy Reform in China,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64. Oskooee, Mohsen 1998 "Cointegration Approach to Estimate the Long-run Trade Elasticities in LD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12(3): 89-96.
65. Qian, Yingyi, and G.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5): 1143-1162.
66. Qian, Hong 2007. "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Balances under the Dollar Standard"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9(5): 765-782.
67. Shafaeddin, S. M. 2004 "Is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Threatening Expor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5(2): 109-144.
68. Song, Zheng, Støresletten, Ketil, and Zilibotti, Fabrizio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69. Venkatesh, A. 1995 "Ethnoconsumerism: A New Paradigm to Study 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Consumer Behavior" In *Marketing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ed J. A. Costa and G. Banossy, 26-67.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70. Wakabayashi, Masayo, and Landis, Madeline 1999. "Demographic Trends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Interim Reports on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Receive only Limited Review, November 1999.
71. Wiener, Calla 2008 "The Saving Story behind China's Trade Imbalance" Working Paper,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Research Associate,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72. Wilson, John F., and Wendy E. Takacs 1979. "Differential Responses to Price and Exchange Rate Influences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Selected Industrial Countr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1(2): 267-279.
73. Wolf, Martin 2005. "Will Asian Mercantilism Meet Its Waterloo?" Richard Snape Lecture, Australian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Canberra, November 14.
74.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5. Young, Alwyn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091-1135.

Review and Prospect on China's Trade Surplus

Wang Jianfeng¹ and Gu Biao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Applied Financ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former researches, firstly, the paper confirms there are three basic factors determining China's trade surplus. Secondly, for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RMB, trade policy and gross national income's failure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share of China's trade surplus in GDP, the paper focuses on saving-investment in balance, which relates with national income structure. Thirdly, integrating relative literatures on economic policy, the paper finds that not only the deflection of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which leads to high saving rate but also the huge quantity type of monetary policy which decreases the ratio of saving being turned to investment, may have high correlativity with Chinese-style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Some topics concerning with this problem should be explored further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rade Surplus;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National Savings Rat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redit Constraints

JEL Classification E01, F41, H77

(责任编辑: 陈永清)